

“战争”隐喻下的疫情叙述

□吴 媛

文坛观察
WENTANGGUANCHAO

■ 当时间的距离被拉开,当我们从“战争”叙事的隐喻中回到个体经验,关于疫情的每一个数字都是具体的、个人的、感官的,每一个事件都会进入个人经验从而成为时代记忆,每一段记忆或者故事都会被文学艺术发现并不断书写和重建,这是战时状态缓和后人们的必然选择。

疫情不仅仅是疫病的发生和发展情况,还是一个庞杂的话语场。当人类被迫面对突如其来且未知的强大对手时,日常语言不足以承担对其进行讲述、表达的任务,而“隐喻”就以其独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成为人类进入疫情叙述的有效途径。

这里谈到的隐喻不只是语言的问题,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到,隐喻实质上是依据一种事物去理解和体验另一事物。隐喻把两种不同的事物相关联,是因为我们认知这两种事物时产生了相似联想,使得我们能解释、评价、表达对客观世界的感受,所以这种相似性其实是认知的结果。就像我们把时间比作金钱,隐喻不仅意味着“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比喻句,更重要的是,它引导我们用认识金钱的方式去认识时间,为我们揭示出时间是如何被“消费”“节约”“交易”的。这种认知方式同样发生在“疫情”与“战争”的隐喻之间。

在普通疾病中,参与者仅限于医生、护士、患者、家属,这是完全个人的体验;而大型传染疾病,则将影响范围从单纯的医疗体系扩大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当疾病再度升级,从个体经验越出,成为一种公共叙事,成为大众体验时,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于是在群体应激反应下,“疫情”与“战争”隐喻便建立了联系。面对严峻的疫情,文艺家不约而同选择用“战争”隐喻来感受、认知、讲述。

疫情期间创作的很多歌曲,诸如《致敬,白衣战士》《最美的英雄》《每个人的战争》《中国阻击战》等,都是在“疫情一敌人”“医务人员一战士”“治疗一对战”的系列隐喻中展开的。歌词“这是每个人的战争,四处也有看不见的敌人……这是每个人的战争,各尽所能就是新的长城”“灾难突降,集结号吹响,千军万马奔向同一个战场”慷慨激昂,振奋人心。书法、美术、摄影是形象艺术,“战争”隐喻也渗透进作者的创作。美术作品中钟南山、张定宇英雄化的肖像比比皆是;摄影作品中也常见医务人员整装待发,一片白衣执甲的感人场面。这些语言和形象的象征内涵、情感底蕴完全契合并且有效呈现了当时国人的现实感受和情感指向。

对国人来说,真正的战争硝烟虽已散去,但有关战争的叙事并未走远。《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等小说和改编的影视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人的战争想象。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某种程度上说并不仅仅是创作技巧,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叙述态度。当我们在和平年代面临这样一场浩大的“战争”隐喻时,文艺家很容易从曾经的战争叙事中汲取审美方式、叙事手段,受众也会顺理成章从战争叙事中找到与当下抗疫作品产生共鸣的途径。

关于胜利的浪漫主义想象,对英雄的刻画和讴歌,关于死亡的悲剧意识,构成了“战疫”文艺作品创作主题和情感表达的主要倾向。

在强大的“战争”隐喻下,医生、护士有了战士的形象,绘画和摄影作品对他们出发或返回的场面情有独钟,这些画面被阐释为“出征”和“凯旋”,从而使作品具有高度的象征意味,并很自然地被大众接受。病毒被人格化为敌人,这一方面便于艺术作品的形象表达,一方面也是抗疫的需要。医疗专家因高度契合在“战争”阴影下人们对英雄的渴求,有关他们的诸多作品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指向——对英雄的塑造和讴歌。

“战争”隐喻背景下,短期的、即时的文艺创作更注重舆论引导性和社会功能性,这既是现实需要,也是文艺家应有的选择。在毋庸置疑的紧张感挤压下,文艺作品更强调大多数人的意志,强调民族情感和社会共同理想。

但疫情终究不是战争。二者之间虽然由于有着巨大的相似性从而形成了被普遍接受的隐喻关系,但差异仍然在很多细节处存在。疫情是人类肉身上阵的遭遇战,感染疫病的痛楚、等待治疗的焦虑、失去亲人的苦痛都是极其个人化的经验感受,文艺必须承担起对这些具体经验进行表达的责任。

经历过最初的慌乱、迷茫、疼痛之后,当大众乃至整个社会开始对疫情进行反思,文艺领域也就相应出现了对“战争”隐喻在一定程度上主动疏离。今年年初,石家庄疫情来袭,很多诗人的创作就体现出这种倾向。胡茗茗每日记录居家期间的个人感受,在日常书写中记录大时代的悲欢,作品克制、简

洁,不放纵想象,也没有情感的泛滥,她将作品以“有些事只有亲历才能讲述”为题统括之。韩文戈、李寒、辛泊平等诗人也力图站在亲历者的角度对疫情进行个人化的独特书写。这些作品体现了文艺对人的生存体验的细致呈现,是紧张气氛之下关于普通生活的平和表达,是对“战争”隐喻的反拨和补充。当时间的距离被拉开,当我们从“战争”叙事的隐喻中回到个体经验,关于疫情的每一个数字都是具体的、个人的、感官的,每一个事件都会进入个人经验从而成为时代记忆,每一段记忆或者故事都会被文学艺术发现并不断书写和重建,这是战时状态缓和后人们的必然选择。

疫情状态下的“战争”叙事为每个人创造了参与感,为我们在最短时间内凝聚力量提供了精神动力,这并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引导,更多的是人类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应激反应,是我们所需要并主动选择的结果。但同时文艺创作中也要警惕过度的“战争”隐喻导致大众对于赋予荣誉、宏大叙事一类话语的逆反情绪。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提出对疾病的叙述要“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她的论断有其具体语境,但就当下的疫情叙述而言,避免隐喻性表达的过度泛滥,避免意义的无效扩张,让叙述回到经验本身,也许正是文艺家的当下表达所应该具有的现实面向。



□房 伟

作为中国网络文学第一批作家,蔡骏被誉为“中国悬疑小说第一人”。近些年,他始终保持对“夜”的执着,从精选集《最漫长的那一夜》到新作长篇小说《春夜》(作家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夜”之意象成为其作品悬疑诡谲气氛的重要配色。不同的是,《春夜》少了离奇曲折,多了具体可感的地域历史细节,悬疑是现实题材的一抹配色,对城市与时代的怀旧成为小说的真正底色。

《春夜》以第一人称叙述,围绕上海春申机械厂在中国社会变革下的百年兴衰存亡,以新、老工人张海、神探亨特、再阿让、钩子船长等为主要人物,以厂里曾经发生的两起悬案为线索,通过人物不同的人生际遇,牵引出一系列与时代命运环环相扣的沪上往事,展现了上海的日常生活图景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史,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悬疑氛围和现实主义色彩。

在蔡骏变化万千的笔下,悬疑不再受限于狭隘的小说类型,愈发成为一种随物赋形的气质与表达方式,任其所用。《春夜》拿出作家“蔡骏”的真实身份,使小说叠合了个人真实的成长经验。他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从始至终的目击者与参与者,这一限制性第一人称视角,虽然增加了厘清事件全貌的难度,却大大增强了代入感和真实的历史细节,夹带了作者关于上海回忆的独特“私货”。

国营老厂的变化牵动着工人命运,折射出城市的变迁。该书聚焦的上海,是粗砺的父辈工厂中的上海,不是法租界精致洋房里的上海;是冰冷的梦破碎的声音,不是华丽的冒险家的乐园;是时代转捩点中平头百姓的日常,不是大时代下光鲜人物的传奇。改革开放、国企转型、国际风云变幻均是小说鲜明的大背景和宏大视角,反映了以现实为旨归的叙事导向。与之相对的个人狭小视角,如童年记忆、青春成长叙事和个人遭际,带着怀旧色彩,试图重现老市民回忆中的市井气息。

小说故事时间线跨越改革开放40年,由1978年到2019年。主人公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上海春申机械厂的历史则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写照:1931年由归国留学生创办,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株式会社接管,1956年公私合营收归国有,世纪之交开始股份制改造,继而破产清算。上海春申机械厂的兴衰与中国当代工厂改革同轨,“我”见证了机械厂的命运沉浮,从忙得四脚朝天到产品积压。作者有意识地将机械厂的命运放诸国际大背景,宏大与细小的对比,在戏谑中消解了历史沉重感,取而代之的是标志性时间节点带来的历史感和共鸣,翻开历史的尘埃,钩沉出上海百年,这是小说现实主义的来源之一。

蔡骏灵活地拿起“悬疑”武器,让小说主人公“我”拥有从小被人托梦的奇异功能,不时有逝者通过梦境向我托付心事,上至大作家卡夫卡、女明星阮玲玉,下至一只猫。于是,“我”在梦境与现实两界自由穿梭,替魂灵传话,了结其心事,也为活人指点迷津,推动小说的前进。该书的悬疑气氛主要由两件悬案贯穿:1990年厂里年轻有为的工程师建人被谋杀,凶手未知;2001年新厂长“三浦友和”带着全厂职工的集资款潜逃,下落不明。《春夜》没有被写成单纯的探案小说,悬案只是吊起读者胃口的调味剂,特异功能也仅仅是情节发展的助推器,蔡骏不再对类型小说中的突变、反转过分执迷,甚至直到结尾也未揭开谜团。从这个角度而言,小说设置托梦人是为在追逐梦境的过程中,弥合过去与未来的断裂,运用超现实的功能实现对现实的寓言式点拨。

小说中,老厂长的意外车祸带走了机械厂辉煌的过去,新厂长的离奇失踪意味着厂子的寿终正寝,大时代弹指一挥间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工厂中悬案引起的悬疑感,意味着普通人命运的漂泊无定。个人命运与上海春申机械厂绑定,主要人物命运轨迹具有时代普遍性,他们身上印刻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在静水流深的时光流泻间,《春夜》关注当代中国社会家庭变迁这一现实题材,突破了历史的细节感和生活的历史感,叙述相对平稳而收敛,成为一部走出类型桎梏的现实主义小说。

重新审视生活与时代的关系

评蔡骏长篇小说《春夜》

新一代青年的军营成人礼 ——评北乔小说《新兵》

□沈松钦

新兵是军人生涯的儿童时代,新兵训练营中的温情和严格,是他们记忆最为清晰、日后谈论最多的话题。北乔小说《新兵》(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讲述了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新兵在训练营中带来的磨炼后,逐步蜕变成为一名军人的故事。小说以新兵训练营为叙事空间,将“情义”深深地植入人物人物的精神血液,铺展人物丰富的情感,字里行间兵味浓郁,是新时代军事题材创作领域里的新收获。

该书最为突出的是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小说以10个新兵为主要描写对象,通过语言交流和行动交往,用对比、衬托的手法,真实细腻地刻画人物性格,使读者从多方面了解新兵的性格特点。章大强自律且喜欢习武,从进营开始就坚持每天早上练拳习武,雷打不动。当积极表现的新兵拿着扫帚清理训练场时,他一个人在训练场打拳,丝毫不在

意别人的目光,他是新兵中特立独行的代表。无父无母的贾海涛性格孤僻、内敛,为了回报养有他的家乡父老,他一心想在军营提干,每天坚持学习英语。这个集体中最不受待见的是吴加林,喜欢耍小聪明、贪小便宜、想方设法逃避训练。他偷用室友的洗衣粉,被当场抓包却丝毫不慌张,说:“大惊小怪的,不就是一点洗衣粉?”一起吃室友的零食时偷偷往自己兜里揣,但是自己的零食从来不给别人吃,甚至不让他们看到。作者还有意塑造了高干子弟小白柱这一人物形象,打破了大众对官僚子弟的刻板印象。他乘着皇冠轿车在中队长的引领下出场,引起了新兵们的骚动。但是小白柱的表现却令大家对他刮目相看,他积极与战友打成一片,分享零食,得到半夜要紧急集合的消息后毫不隐瞒地告诉同寝室的战友……小白柱用实际行动尽力挣脱高干子弟的标签。在七班这个集体中,唐志刚想要结识更多老乡,吴加林喜欢混日子逃避训



练,小白柱想要挣脱高干家庭的束缚找回自己……每个人都在最开始的时候极力表现自己的个性,但后来班长夏奇寒和贾海涛之间发生的“英语乌龙”事件成为各个角色转型的导火索,也是故事的转折点,初来乍到的新兵们收起了自己的锋芒,担起责任,学会融入,也学会分享。章大强每天不再去操场练武,贾海

涛不再埋头死学英语,唐志刚也没有刻意去规划自己的军营之路,在太阳初升的那个早上,他们都拿起了扫帚,亲切地拥抱这个温暖的地方。

作者在军营中构建了一个具有强大情感张力的世界。这个世界中同乡情、官兵情展现了军营中温情的一面,如贾海涛和唐志刚来自同一个地方,他俩把彼此当成依靠和倾诉的对象;唐志刚和三支队长彼此照应……小说的情感力量,不仅体现在新兵营七班的战友们互助友爱中,还体现在他们发生矛盾冲突时的巧妙化解上。班长夏奇寒虽然已经是部队的老兵,却是第一次担任新兵营的班长,在这一层面上,夏奇寒作为班长同样具有“新兵”的色彩。一开始,夏奇寒对每一个新兵都有着无微不至的关照,展现人际关系的融合能力。但此后的“英语乌龙”事件,夏奇寒对贾海涛破口大骂,体现了身处崭新角色中对待战友关系的不成熟。事后夏奇寒真诚地向新兵道歉,和他们掏心掏肺,这一刻,

新兵营七班战士的心紧紧地系在一起。

小说还精心选择军营中平凡却具表现力的事件,用简洁朴实的语言展现人物内心的情感。当班长夏奇寒向贾海涛请教书信中的英语单词时,不懂英语的夏奇寒误会了贾海涛说的英语意思,连续用18个短句大骂贾海涛:“你能耐大了,敢骂班长”“你看你,还有点兵样吗”“别人工作训练,你尽看熊书”……简短的句式,集中且密集,无形之中增添了紧张感,缓急相和,节奏分明。作者不仅描写了军营的日常训练,还融汇了训练营中支撑新兵坚持下去的精神力量,包括队伍之间的拉歌、帮厨、篮球赛等,为读者带来平实又不失趣味的阅读体验。

作者在作品中渗透了个人强烈的情感,使得文字有了蓬勃的生命力,唤起老兵无数回忆。当手臂上的肌肉变得结实,手心结满老茧时,新兵训练营的战士们开始蜕变,面对未来,他们的眼神更加坚定而果敢。

归山深浅去 须尽丘壑美 ——传承文化与精神的太行绘画研究

□侯志江

在巍巍太行山这片深沉的土地上,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性与担当,太行山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太行山给予人们的不仅是巍峨壮丽的自然风光,更重要的是太行文化与太行精神的产生与传承。太行山上的故事不断激励着一代代太行儿女用手中的画笔讴歌太行,传承太行精神。

太行山纵跨四省,北起北京西山,与燕山相连接,南边濒临黄河,西接黄土高原,东边紧临大平原,既有北方山脉的雄伟壮丽,又不乏南方丘陵的俊秀灵动。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太行山这座精神与文化的丰碑,长久地屹立于中华大地上,真切地见证着这块土地上的盛衰更迭,也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与奋发进取的卓越风采。俯瞰历史长河,荆柯刺秦王、狼牙山五壮士、红旗渠工程,桩桩件件无不体现着太行人

民生生取义的大无畏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太行抗战精神,吸引着无数文人墨客前去描绘与赞颂。当浓厚的历史人文气息渗透在艺术创作中时,艺术创作的理论基础得以奠定,各式各样的创作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风格上极具独特性的太行山绘画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我国古今绘画作品中,历代山水画对太行精神皆有充分体现。五代时有荆浩、关仝致力于描绘太行一带壮阔磅礴之势。荆浩所画山水“上突巍峰,下瞰穷谷”,多作大山巨壑,其章法布局为中心全景式的布局,即以主峰为中心,用烟霞的断白,衬托出画面中的中前景。拉开画面的空间感,气势逼人。以太行山为代表的北方险峻的地理环境为其画作赋予了强大的张力,其作品所使用的独特的构图方式又对表现太行风貌的显著特征推波助澜。题材表现与形式张力达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北宋郭熙、南宋李唐与刘松年、明清谢时臣与

王翬倾向于用写意手法表现太行的宏伟气势,他们体察山水之势,形成了独特且具有魅力的太行语言,促进了太行山绘画的形成与发展。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出大量描绘太行风貌的作品,近现代贾又福、侯德昌对以太行山为绘画主题的探索与创新也是彰显太行精神的创作,其饱满宏伟的构图展现了太行的壮美气势与磅礴精神。

在以太行山为主题的近现代风景绘画作品中,传统水墨画对于山势起伏的表现尤为突出——太行山的豪迈之势在水墨画中转为笔墨语言,大面积的黑色赋予画面以稳重、雄浑的气势,独特的山石树木又在庄重肃穆之上增添了不少趣味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贾又福多年来以水墨画太行,展现天地开阔之景象,观其作品犹如置身群山深处,亲历八百里太行的挺拔巍峨。主题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艺术创作仿佛时代的乐章,通过饱满的激情、严谨的构

思与独到的视觉表达使时代精神成为经典。生于斯长于斯的太行儿女与生俱来的魅力与精神特质,为艺术作品赋予了特有的人文气息。从这些优秀的艺术作品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画家们所做的不仅是对太行山景致的简单描绘,更是在通过一幅又一幅厚重而壮美的作品展现中华儿女脊梁上雕刻的民族气节与自信担当,在丰富绘画作品表现题材的同时极大地提升了当代中国山水画创作的语言特色与人文品格。

“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天人合一”,将其运用到绘画创作中,即是要将身心融入山水,让画家之心与自然一同律动。生活在太行脚下,笔者清楚地了解太行的太行山石结构与地形特点,无数次切身领略过太行山的壮美风情,对太行山具有深厚的情感。太行不仅是山,更是一种精神寄托。每每走进太行山,用艺术创作的方式表达在太行精神中的探索过程与心灵体悟,更期待通过

作品与观赏者产生心灵的共鸣。近年来笔者多以油画、水墨画的语言表现太行山的人文风貌,尤其致力于展现太行山的雪后美景。大雪过后,皑皑白雪为太行山蒙上一层静谧的面纱,太阳慢慢在云层中浮现,阳光仿佛下一秒就要冲破云层,雄浑苍劲的山峰隐于茫茫大雪之中,在冬日暖阳的映衬下显得更加深沉壮美、神秘难测。作品中每一笔线条、每一种色彩都蕴含着对太行山的无上敬畏与深沉爱意,更彰显出太行儿女的奔放性格与豪迈情怀。

壮美太行,情怀如山;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在包孕着勇敢无畏“太行精神”的绘画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艺术工作者所做的不应当只是体现万物的自然之美、追求人性与自然的对话,更应当力求创造出充满张力的具有时代精神的独特作品,不断发掘太行绘画的时代价值,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华民族革命精神在新时期的时代内涵。